

韓中文學翻譯和文化翻譯的政治學

Literary Translation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林春城 (Yim Choonsung) *

一、「文化性轉向」和「翻譯研究」的興起

「翻譯研究」(translational studies) 和 20 世紀 70 年代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有著密切的聯繫。「文化轉向」是人文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們，自 20 世紀 70 年代初開始，以文化為當代討論的焦點開始發展的運動。這擺脫實用主義認識論，將重點放在如斯泰因梅茨 (Steinmetz, G) 認為文化轉向『包括從以前在社會科學的邊緣領域裡發展的、豐富多樣的新的理論性衝擊中產生的廣泛領域』，尤其是後／脫結構主義、文化研究、文化批評，以及語言學分析的多種形態等均如此。這一領域強調『由文化過程和意義系統的因果性和社會性構組成的作用』，¹ 由此看來可以知曉自後／脫結構主義開始，知識革命的進行具備「文化轉向」的主題意識。所謂「文化轉向」的大潮流除了「翻譯轉向」(translation turn)² 之外，還包括「文化研究轉向」(cultural studies' turn)、「空間轉向」(spatial turn)³ 等。

「翻譯研究」是 translational studies 的翻譯語，這裡 studies 是為了解決以往學科難以解決的學問領域，為了跨學科、融合性研究產生的術語。比如「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電影研究」(film studies)、「後／脫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 以及「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 等等。或者不滿足於「研究」(studies) 的表述，濫用「文化學」、「女性學」、「區域學」、「電影學」、「都市學」等術語。這是尊重「學」(～logy, ～ics)」的意思，為樹立新興「學」(～logy, ～ics)」的宗旨而生，值得稱道。但是既然以往分科學術體系無法解決的領域出現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開設跨越以往的分科學術體系進行跨學科、複合型「研究」領域，但是樹立新興「學」的行為卻輕視了這些意圖。

翻譯的歷史雖長，「翻譯研究」的歷史卻出現很晚。「翻譯研究」於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出現在世界舞臺，逐漸受到矚目，80 年代奠定了基礎，90 年代形成了獨立的學科。⁴ 更具體一點來看，1959 年羅曼·雅可

* 作者為韓國國立木浦大學校人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科教授。(王凌雲翻譯，煙臺大學國際處科長)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ltural_turn (檢索時間：2017.1.9)。

2 此為蘇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在「文化研究的翻譯性轉向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的語境下使用的用語。也可表述為「翻譯研究的文化性轉向 (The Culture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3 「空間性轉向」是指涉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領域，用以描述強調場所和空間的知識運動的術語。這與對歷史、文學、地圖製作及其他社會研究的品質研究具有緊密的聯繫。這種運動在為文化、地區及特定區域的研究提供大量資料上影響很大。

4 蘇珊·巴斯奈特著，金知源、李瑾禧譯，《翻譯研究：理論和實際》(首爾：韓信文化學社，2004)，頁 11。

布森把翻譯分為「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⁵以來，作為學科領域的「翻譯研究」，霍姆斯將「對翻譯現象以及和翻譯相關的複合型問題」進行研究的學問，命名為「翻譯研究」。⁶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的翻譯研究結合後／脫殖民研究，才重新發展為新階段的融合性領域。

二、韓中文學翻譯和後／脫(post)韓流的問題意識

韓中建交後，兩國的文學翻譯在數量上大幅增加。在韓國，借助「韓國文學翻譯院」(Korea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和「大山文化財團」的支持，韓國大小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均被譯作中文出版了。按照韓國文學翻譯院的統計，截止2007年為止有367種，截至2017年有714種。與之相反，得益於韓國出版界的中國風，中國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幾乎悉數被韓國「自發」翻譯出版。

筆者曾在2008年受韓國文學翻譯院之邀，針對中國的韓國文學⁷翻譯、出版做過考察，就韓中文化交流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寫過文章。文中指出，當前韓中文化交流呈現嚴重的不均衡。由於受韓流現象影響，從韓國到中國的流動看似是主流，那不過是局限於大眾文化的一時情況，從韓流以外的領域，即教育和翻譯方面，以及相關書籍出版的數量來看，從中國到韓國的潮流是壓倒性的。韓國和中國的文化交流表層上呈現出典型的翻譯不平等關係。⁸當然，韓國和中國的關係雖然不能被理解為被支配文化和霸權文化，但源自兩國文化底蘊差異的流向確實是難以否認的。韓中翻譯現象中並非是「極度

非對稱的關係」，但暴露出「不均衡和不平等的關係」究竟源於何處？可以說要從文化底蘊和規模差異中尋找重要的原因。

韓中文化交流的不均衡，在文學作品翻譯中得到深刻體現。中國文學作品被大量翻譯、介紹到韓國，與此不同，韓國文學作品如果沒有韓國的支援是無法得到很好的介紹的。韓中交流的根本範式要得以修正，韓國文學作品為了和中國讀書界接軌，作品選定的問題，作品性的鑒定，評審的標準和制度，中間人(mediator)的必要性⁹等需要先行開展。除此之外，有必要理解中國出版機制，注視中國的話語權力。從大輪廓上看，在現在中國的出版界、文化界和評論界，韓國文學的位置微乎其微。上海人文社會科學專門書店——季風書店裡，有日本文學專用書架，但韓國文學莫要說專用書架，甚至未被陳列。這當然也歸咎於韓國文學的成果未被介紹宣傳到中國這一點，但也因為韓國文學界傾向西歐的風土。代表韓國文學界的學者和評論家，對中國的理解，尚未脫離《三國演義》，僅限於近現代魯迅等寥寥幾位作家。中國學者和評論家的情況也大同小異。為了韓中兩國文化的溝通，兩國話語權力的主體需要相遇。需要形成韓國的韓國文學者直接閱讀中國學者的文章並引用所需要的部分，中國的評論家讀韓國學者的文章，互相討論指點的風潮。不論是互助還是批評，通過相互間的閱讀進而形成理解，這才是實現交流的方法。不是為了展示自己的水準，而是需要真正關心對方的時候。這樣，才可以走向相互理解和溝通。這是韓中文化交流的捷徑，進一步是韓國文學和世界文學溝通的發展方向。

韓流在東亞掀起一股熱潮的時候，韓國社會對東亞大眾文化的關心也達到了高潮。雖然初期對韓流的評價加上了諸如愛國主義的、通俗報刊雜誌式的、煽情的

5 Roman Jac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Jeremy Munday 著, 丁延一、南元俊譯, 《翻譯研究入門——理論和適用》(首爾:韓國外國語大學出版社, 2006), 頁2, 再引用。

6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unday (2006): 3, 再引用。

7 與臺灣有臺灣文學一樣，韓國(南韓)有韓國文學。韓國文學是，韓國人或使用韓國語的人，基礎於韓國的思想、感情和情緒等的具有價值的經驗，借鑒了時代的表達方式而形象化的文學的總稱。關於其具體的內容，請參考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檢索時間: 2019.1.14。

8 林春城, 〈關於韓中文化溝通與跨越的考察——以韓國文學作品在中國翻譯出版現狀為中心〉, 《學術界》157 (2011): 26。

9 同上註, 頁24-25。

等很多修飾語，但是韓國學者認識到在東亞域內日流（J-pop）和粵語流行文化（Canto-pop）的存在，站在「全球性文化」（global culture）的視角上，對韓流的關心主要是把焦點放在「跨國性（transnational）文化流動」上進行研究。如果用「全球性」或者「跨國性」的問題意識來看待韓流，可以超越初期將其視為單向影響的評價。趙韓惠貞¹⁰將韓流作為20世紀90年代在東亞地域掀起的一種「越境的」、「跨國性」的文化生產和流通狀況來把握，由此將其視為可以謀求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以外的其他可能性的物件進行了考察；¹¹金賢美從女性主義和「文化翻譯」的觀點出發，提出韓流是構築「新女性主義」和跨文化的「女性話語」機制的獨特解釋；¹²姜來熙將韓流與20世紀80年代民主化運動的脈絡相聯繫，從與「新自由主義世界化」的矛盾關係中對其進行再解釋。¹³他們的研究與從低級的民族主義或者文化霸權主義的觀點對韓流進行誇張解釋的初期階段的評價相比是進步的。以這樣的省察為依據，「後／脫韓流」的問題意識也被提起。

「後／脫韓流」是跨國（trans-nation）、去領土（de-territory）、跨界（trans-border）等問題意識的具體表現。所謂後／脫韓流具有「後期韓流」和「去韓流」的雙重意義，放棄關於韓流的既有的文化霸權主義的想法，將韓流當作聯繫日流和華流的媒介，令東亞想像成獨立的單位。所以崔元植在東亞區域內考察後／脫韓流的概念，提出了中、日、韓到目前為止各自對引領本國大眾文化的反駁表現為韓流、日流、華流的主張。¹⁴這種反

思不但超越本國中心主義，而且在東亞大眾文化溝通中，聚焦接受本國以外的他國文化的語境。這樣的反思在認可文化交流的雙向特性，超越國家、性別、人種、時代等的界限，抱有彼此溝通的希望時，可以實踐。

文學如果克服了語言的障礙，那將是超越國家、性別、人種、時代等界限，實現彼此溝通的優秀體裁。如果保留東方主義的嫌疑，我們讀到的無數世界名作就是很好的例子。無數的古典和經典如此，第三世界作家最近的作品也是如此。並且韓國文學如果真的希望與中國文學、東亞文學、世界文學溝通，需要具備後／脫韓流的問題意識。首先打破嚴肅文學和大眾文學之間的壁壘，接受韓流是和日流及華流溝通而形成的文化這一後／脫韓流的問題意識。韓國文學做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的媒介，使東亞文學作為獨立單位的想像得以實現，東亞文化進而努力同世界文學進行溝通。並不視世界文學為抽象概念，如果認同視它是「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角逐、競爭的平臺」，為了與毗鄰國民文學角逐、競爭，也需要與各國的「國民文學」雙向或者多向溝通，而這些溝通要始於翻譯。

三、後／脫殖民翻譯研究的理論結構

最近，「翻譯研究」如火如荼，超越強調「字對字（word to word）」的直譯與強調「意對意（sense to sense）」的意譯的簡單二元對立已經過去許久。¹⁵道格拉斯·羅賓遜（Douglas Robinson）著有將後／脫殖民主

10 最近韓國的一些女性主義者基礎於兩性平等的觀念，主張平等跟隨父、母的姓。比如，趙韓惠貞的韓是跟隨母親的姓。但是法律還規定跟隨父親的姓。

11 「所謂『韓流熱潮』指的是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以中國為首，臺灣、香港、越南等國家和地區的居民，特別是青少年對韓國歌謠、電視劇、服飾、觀光、電影等大眾文化的享有和消費趨向。作為與包括跨國資本移動在內的多層移動現象相應而生的事件，韓流不是通過壓縮的近代化過程各自確保了經濟力的東亞居民享有西方大眾文化的現象，而是通過享有東亞地域的大眾文化，在表露出獨自想成為認識主體的強烈欲望中掀起的意味深長的活動。」趙韓惠貞，《「韓流」和亞細亞的大眾文化》（韓文）（首爾：延世大學校出版部，2005），頁2-3。

12 金賢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翻譯》（韓文）（首爾：Alternative Culture Publishing Co.，2004）。

13 姜來熙，《新自由主義和韓流——韓國大眾文化的文化橫斷》（韓文），《中國現代文學》41（2007）。

14 崔元植，《後／脫韓流時代的入口》，仁川文化財團，《平臺》7（2007）：20-21。

15 尹成午，《翻譯學和解釋學在哪裡如何相遇？》，保羅·利科（Paul Ricoeur）著，尹成午、李香譯，《翻譯論——關於翻譯的哲學省察》（首爾：哲學和現實社，2006），頁37。

義理論和「翻譯研究」聯繫起來的名著——《翻譯與帝國》，該書緒論部分對「字對字」和「意對意」翻譯的古代區分的最近發展做了如下介紹。朱莉安·霍斯（Julian House）區分了「提醒提供的文本是翻譯」的「顯性（overt）翻譯」，「假裝用接受語言翻譯原文的翻譯」是「隱性（covert）的翻譯」。¹⁶ 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將 F·施賴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macher）所說的「讓讀者向原文作者靠攏」和「讓原文作者向譯文讀者靠攏」分別稱為「異化（foreignizing）翻譯」和「歸化（domesticating）翻譯」。¹⁷ 現在的翻譯問題已經不再是將原文偏誤、曲解、脫離之類等價翻譯當作問題，而是「喚起是翻譯的事實」還是「假裝是原文」的問題，作者中心的異化翻譯還是讀者中心的歸化翻譯問題。

羅賓遜認為「長期以來，有關翻譯研究的二元論」在「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由人類學、民族志學和殖民主義歷史中誕生的、關於翻譯的新的重要的接近方法——後／脫殖民主義翻譯理論或者與帝國相關的『翻譯研究』討論中被證明是不恰當的」。¹⁸ 此前階段，第一世界人類學者進入第三世界原住民地區，進行實地調查、參與觀察並記錄的「民族志」，被判定在語言和溝通上有問題，對兩者的文化間衝突產生興趣，以致「後／脫殖民翻譯研究」不知不覺之間出現了。「後／脫殖民翻譯研究」就是要在後／脫殖民主義和翻譯之間搭建橋樑。「後／脫殖民主義始於文化間的差異，逐漸認識到文化以語言為媒介，需要持續研究的、最重要的通文化性現象之一就是翻譯」。¹⁹ 「後／脫殖民翻譯研究」也背負著「通文化性溝通的人類學研究」的債務。因為它們把翻譯問題理解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

「現代」和「原始」、殖民主義者和被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社會、經濟性相互作用，以及所有溝通的主要爭點。²⁰ 如此看來，「後／脫殖民翻譯研究」由單純地和殖民地相關的「翻譯研究」，通過邊緣化，將統治他者的所有現象包攝為研究物件。

實際上，羅賓遜把「後／脫殖民翻譯研究」分為三個階段。作為『殖民化』管道的翻譯；作為殖民主義崩潰後，為了『殘存的文化間的不平等』的避雷針的翻譯；以及作為『去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管道的翻譯」。²¹ 如果第一階段的主體是過去的西歐，第二階段是現在的調整狀態，第三階段則是未來要樹立原住民為主體。這和他設定的後／脫殖民研究的範疇重疊。具體來看，首先，獨立後研究（post-independence studies）的後／脫殖民主義是觀察獨立後的歐洲前殖民地歷史的一種方式；歐洲殖民化之後研究（post-European colonization studies）的後／脫殖民主義是觀察歐洲的歷史和過去四、五個世紀歐洲在政治、文化上所影響到的領域的一種方式；權力關係研究（power-relations studies）的後／脫殖民主義，是觀察地理的、語言的轉置（displacement）以及支配和服從交織的動力引起的心理性、社會性變形的通文化性權力的方式，這試圖說明一種文化被另一種文化支配的方式。²² 特別是權力關係研究作為「所有文化／社會／國家／民族同其他文化／社會／國家／民族間的權力關係研究」，這裡「後／脫殖民在政治性和文化性權力關係中」，被稱為「20 世紀後期的觀點」，包括「所有人類的歷史」。²³ 前面提到的「後／脫殖民翻譯研究」的三個階段和「權力關係研究」緊密相連。換句話說，「殖民化」管道的翻譯階

16 Julian House,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77)。道格拉斯·羅賓遜著，鄭惠旭譯，《翻譯和帝國——後／脫殖民主義理論解釋》（首爾：東文選，2002），頁 7，再引用。

17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羅賓遜（2002），頁 7，再引用。

18 同上註，頁 8。

19 同上註，頁 10。

20 同上註，頁 11。

21 同上註，頁 15。

22 同上註，頁 28-29，概要。

23 同上註，頁 27。

段，殖民主義者「為了統治、教育、全面培養被殖民民眾」²⁴而利用了翻譯，但「去殖民化管道的翻譯」階段中，拒絕殖民主義者的統治和教育，原住民卻成為翻譯的主體。

權力關係研究也是對翻譯不平等的研究。後／脫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家理查·雅克蒙德（Richard Jacquemond）以法國和埃及的接觸為焦點，對霸權文化和被支配文化之間的翻譯不平等性進行了論述。依據他的觀點，霸權文化在被支配文化中，被翻譯再現，較之被支配文化在霸權文化中的翻譯，數量更多，受到範圍更廣的讀者大眾的青睞，它們因為產自霸權文化中而被選擇。被支配文化總是在霸權文化中通過翻譯呈現，這種翻譯較之霸權文化的翻譯，數量少內容難，只適合專家關注、只順應霸權主義性典型的被選擇。²⁵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為了克服歐洲和非歐洲的不平等提出以下解決辦法：「使『歐洲』，即近代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國族主義依靠它們的合作性冒險和暴力令自己普遍化的那一『歐洲』進行地方化（provincializing）的計畫」。²⁶把歐洲地方化就是在權力關係的角度把以往視歐洲和非歐洲為中心、邊緣或者普遍、特殊的結構解體，視歐洲為「其中之一（one of them）」，設定非歐洲與之平等。15世紀末資本主義衝破伊斯蘭的包圍網，從陸路和海陸突圍，侵佔掠奪非歐洲地區，強調白人資本主義文明的優越性，形成霸權（hegemony），命名（interpellation）非歐洲人為「他者」，貫徹歐洲的霸權歷史，對此我們都很清楚。殖民霸權和命名在獨立後依然殘存。

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Tejaswini Niranjana）認為

被殖民的印度人的命名因為翻譯而可能。「印度文本的歐洲式翻譯總是把『受教育』的印度人提供給西方讀者，總體充滿著東方主義的意象」。²⁷所以羅賓遜解釋「之於她，後／脫殖民主義的計畫是為了讓有被殖民經驗的民族持續去殖民化而再命名，有必要再翻譯原住民文本和其主體」。²⁸「為再命名原住民的再翻譯」需要何種策略？那就是「文化翻譯」。

被公認為後／脫殖民翻譯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的起源或者文化翻譯性思考的根源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並未把翻譯設定為單純的語言轉換，而是從歷史的觀點溯本求源地歸根於哲學。他的「歷史性翻譯哲學」直至今天依然為眾多的「翻譯研究」學者視為理論靈感的源泉。所以他篇幅不長的《翻譯者的任務》（1923）需要不斷地被再解釋。他翻譯哲學的核心是不可翻譯性，忠實，異化翻譯等。首先來看他被提及最多的話：「囚禁於陌生（原作）語言的魔力中的純粹語言，翻譯者通過自身的語言令其解放，將困頓於作品中的語言通過作品的再創造（Umdichtung）解放出來，這是翻譯者的任務。為了這純粹語言，翻譯者要打破自己語言的舊壁壘」。²⁹本雅明的不可翻譯性是可能性潛在的不可能性。現在雖然不可能，通過不斷的努力變得可能的不可能性。因此，那是「未來翻譯可能的、現在的不可能性」。本雅明表述其為「純粹語言」。「翻譯是轉變原作（the original）為其他語言的行為，被轉換的物件並非原作本身，而是原作中潛在的可能性」，本雅明稱為「純粹語言」（pure language）的可能性雖存在於原作，但它不以原作為終結的特徵，同時也是無法被還原為表像可能的意義秩序的特徵。³⁰純粹語言相當於源

24 同上註，頁15。

25 Richard Jacquemond,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Case of French-Arabic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羅賓遜（2002），頁52-53，概要再引用。

26 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 *Representations* 37 (winter1992), pp. 20-21. 羅賓遜（2002），頁36，再引用。

27 Tejaswini Niranjana,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31。

28 羅賓遜（2002），頁41-42。

29 瓦爾特·本雅明著，崔成萬譯，《關於一般語言和人類語言／譯者的任務外》（首爾：圖書出版路，2008），頁139。

30 李明昊，〈文化翻譯的政治性：異國性的解放和做鄰居〉，《批評和理論》15.1（2010）：235。

泉 (origin)。本雅明算是提醒原作或原本不是源泉即不是純粹語言的單純事實。純粹語言是無法通過意思轉達到達的本質性東西，其組成「無法把握的，神秘的，詩般的」的「真理的語言」，也即「真正的語言」。³¹「打破原本 = 起源、翻譯本 = 衍生物的存在論性序列，可以開啟實現原本和翻譯各自固有的如星星般的、稱之為純粹語言源泉的潛在性的『獨立的』途徑，同時它們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整體，提示構成『星座』(constellation) 的可能性，這是本雅明翻譯理論的魅力及長處。」³² 這樣的論述具備說服力。原本和翻譯本可以翻譯更本源的源泉純粹語言的可能性與它們構成星座的可能性，這對許多後／脫殖民翻譯研究的學者來說是理論靈感的源泉。

特賈斯維莉·尼南賈納解讀本雅明的翻譯者的任務為「歷史家的任務」，勞倫斯·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 從本雅明處學習到「翻譯的倫理」命題，也就是提供讓讀者和本國語言維持生疏距離的省察性視線的「翻譯的倫理」命題。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的移民的任務和他者性的異國化也大大借助於本雅明的譯者任務和純語言。本雅明的「歷史性翻譯哲學」的理論結構和對其影響的深層分析以後另文討論。

四、文化翻譯的政治學

在最近的翻譯研究領域，相比語言為中心的一般翻譯，「文化翻譯」更引人矚目。「後／脫殖民翻譯研究」最重要的核心語「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 或者「文化間翻譯」(translation between cultures) 正處在媒介「文化研究」、「後／脫殖民研究」、「翻譯研究」的接觸地帶 (contact zone)。

金賢美認為「文化研究中關於『翻譯』和『橫跨』的關心倍漲，這在理論上存在後／脫殖民主義批評和批

判人類學鼓吹的部分，但是和我們現實生活條件的飛速變化的事實也有關聯」，³³ 她就將「文化翻譯」備受矚目的原因概括為如上兩點。如同 20 世紀 60 年代，迫使伯明罕學派學者從當時風靡英國的利維斯主義脫離出來，關注工人大眾文化的一樣，「此時此地 (now and here)」的現實條件，要求我們在飛速變化的 21 世紀直面現實。關心文學／文化研究的相當一部分學人卻對政治沒有興趣，也不願把興趣放在政治上。但是如果說「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本身就意識形態緊密相連，我們就不得不關心圍繞「文化翻譯」的政治學。福柯早前通過話語權力和知識權力概念，道破知識和話語同政治權力並非無關。最近姜來熙提出「文化政治經濟的問題設定」，他的問題設定並不僅限在單純地將文化、政治、經濟三者簡單結合的層面，而是通過「文化性政治經濟」、「經濟性文化政治」、「政治性文化經濟」³⁴ 三要素的多種組合，主張文化、政治、經濟不可分離。姜來熙是一位長久以來投身於批判性「文化研究」的人文學者，他既然在僅研究文化是做不好「文化研究」的心得基礎上，提出「文化政治經濟的問題設定」，關心「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的人文學者們便有必要傾聽這樣的主張。

在此我們需要關注一下周蕾 (Rey Chow)，她以跨文化 (transcultural) 交流的問題意識，把中國電影當做物件，試圖用民族志理論來補充「文化翻譯」。她認為到目前為止的民族志是不平等的「文化翻譯」。因為西歐觀察者主觀再現非西歐觀察對象。³⁵ 「看是權力的一種形式，被看是沒有權力的一種形式」，³⁶ 以這種視覺性 (visuality) 為媒介，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從前「被看的」(to-be-looked-at) 對象的土著民重新誕生成為新的看的主體。她「最終要討論的是，電影既是一種後／脫現代性自我描述 (self-writing) 或者自我民族志 (auto-

31 本雅明，《關於一般語言和人類語言／譯者的任務外》，頁 134。

32 同註 30，頁 237。

33 金賢美，《全球時代的文化翻譯：跨越性別，人種，階層的界限》(首爾：另一個文化，2005)，頁 41。

34 姜來熙，《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和文化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社，2014)，頁 108-126。

35 周蕾著，鄭在書譯，《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欲、民族志，現代中國電影》(首爾：Isan，2004)，頁 266。

36 同上註，頁 32。

ethnography)，也是後／脫殖民時代文化翻譯的一種形態。」³⁷當然這是和「我們的是好的！」式的防禦性土著主義不同。周蕾的「文化間翻譯」因為是聚焦西方和東方、「原著」和「翻譯」之間的不均衡性和位階性權力關係，³⁸所以沒有具體談及東亞內「文化間翻譯」。但是她的「文化間翻譯」，既然「包括從傳統到近代，從文學到視覺性，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從土著的到外國的，從外國的到土著的等等變化以及廣泛的行為整體」，³⁹我們通過它囊括在東亞域內廣泛的橫跨和溝通，看似也沒有困難。

事實上「跨文化概念，經由瑪麗·路易士·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著作《帝國的眼——旅行記和跨文化》，進入英語圈文化理論。」⁴⁰依普拉特之見，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是「邊境的從屬集體，在被支配文化或殖民地本國的文化轉達給自己的內容之中，著眼並選擇的方式」。⁴¹這是普拉特借用「古巴的社會學家費爾南多·奧爾蒂斯（Fernando Ortiz）對非洲裔古巴人的文化進行先驅性研究，1940年提出的表述」⁴²來說明接觸地帶的文化現象。所謂接觸地帶（contact zone），「如同支配和服從、殖民主義和奴役制度等極度非對稱關係中，或者如同這些今天依然縱橫全球維持至今的極度非對稱的關係所引發的結果中，雙異種化相遇撞擊，互相對抗的社會性空間」。⁴³由於西歐帝國的侵略，淪為殖民地的非西歐地區的居民是被西歐帝國主義所「想像

（imagined）、發明（invented）、構成（consisted）、組織（organized）」的。⁴⁴普拉特的主要問題意識是觀察「到非西歐地區旅行的歐洲人書寫的旅行手冊如何為『本國的（at home）』歐洲人製造帝國秩序，並在帝國的秩序中是否可以為本國的歐洲人提供空間。」⁴⁵但是她強調的「極度的非對稱的關係」的「異種文化」相遇的「社會空間」的範圍可以更廣泛。尤其是「接觸地帶的語言」，比如皮欽語、克裡奧爾語等雙重語言是「文化翻譯」的重要節點。此文關心的韓中間「文化翻譯」，也可以看做是「異種文化相逢的社會空間」的文化現象。

五、《英雄門》現象和《魯迅全集》翻譯

跨國性文化橫跨和溝通的時代，「文化翻譯／文化間翻譯」成為必須的任務。這裡我們以20世紀80年代後期橫掃韓國的金庸的《英雄門》現象和《魯迅全集》的翻譯為個案考察一下。

李致洙將中國武俠小說在韓國的翻譯介紹時期分為「金光洲時代」、「臥龍生時代」、「金庸和其他時代」三個時期。《京鄉新聞》1961年6月15日至1963年11月24日共連載了金光洲⁴⁶的《情俠志》810回（原作：尉遲文，《劍海孤鴻》）可以算是在韓國翻譯介紹的中國最初的武俠小說。此後，《飛虎》等在報刊上連載，《黑龍

37 同上註，頁11-12。

38 同上註，頁286。

39 同上註，頁286。

40 約翰·克拉尼奧斯卡斯（John Kraniakouskas）著，季忠民譯，〈翻譯和跨文化操作〉，酒井直樹、花輪由紀子主編，《西方幽靈與翻譯的政治——「印跡」（1）》（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頁100。

41 瑪麗·路易士·普拉特著，金南赫譯，《帝國的眼——旅行記和跨文化》（首爾：現實文學，2015），頁32-33。

42 同上註，頁33。

43 同上註，頁32。

44 林春城，〈東亞人身份認同的形成，障礙和出口：批判性東亞話語為中心〉，《文化／科學》61（2010）：282。

45 普拉特（2015），頁23。

46 金光洲雖然學的不是中國文學專業，但作為一個文人，且1933年在上海留學過，他練就了一手好文筆。雖說中國武俠小說的翻譯工作並非一定要由中國文學專業的人來擔當，但翻譯除了要求語言運用上的能力之外，還要求在此背後隱藏的對文化的廣泛理解。

傳》等被翻譯成韓文。如此可見，金光洲對掀起韓國的中國武俠小說熱，作出了重大的貢獻。⁴⁷韓國武俠小說界的「臥龍生時代」以1966年《玉釵盟》的翻譯為序幕，1968年他的作品被大量翻譯和介紹給韓國讀者：如《武遊志》、《夜笛》、《飛龍》、《無名簫》等。那時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即「假臥龍生小說」的登場，利用臥龍生的名氣將其他武俠小說作家的作品偽裝成臥龍生的作品，這是武俠小說進入韓國以後發生的奇異現象中的一個。⁴⁸通過模仿來鍛煉自己是韓國武俠小說創作的動力。假東西的繁盛反證了原作的厚實（thickness）。1960年代後期掀起韓國武俠小說熱的作家大多屬於以臥龍生為代表的臺灣武俠小說作家群。被稱作「成人童話」的武俠小說寫成於臺灣，消費於韓國的事實反映了兩個國家具有共同的壓抑性社會結構，這必須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

金庸代表了中國武俠小說流行的另一高潮。1986年《小說英雄門》系列出版，在當年翻譯的外國小說中銷量最大，從1986至1989年的三年當中，「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等全部翻譯完了。短短的幾年中外國作家的作品幾乎全部被翻譯銷售的現象可謂是史無前例，尤其在韓國的翻譯文學史上更是十分稀奇的事。對於金庸，不僅在翻譯方面，而且在有關研究他的學術成果方面也十分活躍，說明其文學價值也已得到廣泛的承認。21世紀重新出版的《射雕英雄傳》（2003）、《神雕俠侶》（2005）、《倚天屠龍記》（2007）遵守了保證版權和忠於原作的原則，開創了中國武俠小說翻譯的新場面，這可能是最早的通過與作者簽署版權而翻譯出版的中國武俠小說，而且與以前高麗苑版本相比較，更加忠實於原作，翻譯水準也相當高超。可是，問題是所謂「英雄門少年」不再熱衷於對原著的完譯本。為什麼會這樣？那是因為「英雄門現象」是韓國固有的、與金庸作品的理解有距離的文化現象。

嚴格地說，《英雄門》並非完整的譯本，數量上看它譯出了百分之七十，若從文采和文化方面來評價，是不足百分之五十的粗劣改編。《英雄門》的改編和出版，在韓國語境上，雖然是打破了之前階段武俠志的常規概念的事件，卻對原作的意義和意趣做了相當的破壞。⁴⁹《英雄門》系列「沒有充分翻譯出金庸文本的厚度，只翻譯出武俠表層的這點，成為『文化翻譯』的負面案例。由出版社主導的表層翻譯即使可能在當時符合讀書市場的需求，我們卻也因此放棄了深化學習中國文化的機會。所以21世紀新的完整版翻譯反被讀者回避。」⁵⁰研究翻譯大眾文化中烙印的文化並不簡單。從金庸個案中可以看出商業翻譯停留於表層。一旦誤譯，糾正不再容易。韓國的「《英雄門》孩子」對完整翻譯的「射雕三部曲」不再關心就是佐證。

與此不同，《魯迅全集》在韓國的翻譯自2007年由魯迅專家為中心，「以直面魯迅」的態度慎重開啟，2018年終於出刊了《魯迅全集》（20本）。雖然之前已經有了幾種「選集」，伴隨沒有完整翻譯版的失時之歎，緩慢開始了翻譯工作。以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和2005年版為藍本，參考了國內外研究成果。「這個過程中，幾年之間每月聚集一次，討論翻譯的難題，批判對方的文體問題，彼此調整。所以原則上文集由分別譯者責任翻譯，內容上卻是所有委員的意見滲入每部文集。」⁵¹開始翻譯三年後出版第1卷，歷經十年的2018年完成20卷。由12名組成的翻譯委員會內部雖不可能沒有摩擦，但他們十年來齊心協力進行翻譯和探討。我們為他們的辛勞讚歎。完整翻譯本的出版將成為給韓國魯迅愛好者的巨大禮物，我個人期待討論過程獲得的心得成為韓國「魯迅研究（Luxun's studies）」的堅實基礎。

47 李致洙，〈中國武俠小說的翻譯現況和其影響〉，《武俠小說是什麼》（首爾：藝林企劃，2001），頁73。

48 同上註，頁76。

49 林春城，〈關於中國大眾文化的韓國受眾的跨國研究：電影和武俠小說文本為中心〉，《中國學報》57（2008）：23。

50 林春城，〈東亞論和大眾文化的跨國跨越〉，白永瑞、金明仁編，《自民族文學論至東亞論》（坡州：創批，2015），頁353。

51 韓國魯迅全集翻譯委員會，《魯迅全集》第1卷（首爾：Green Bee，2010），頁17。

六、結語

從東亞區域內大眾文化的橫跨和溝通的觀點來看，東亞首先把資本主義大眾文化的原產地美國設定為「一個地方」，有必要各自記錄「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⁵²嚴格地說，美國大眾文化的大部分可以在非洲黑人文化中尋找根源。現在東亞不必對「源泉」的「美國 Billboard 周榜」戀戀不捨，而是要將東亞自身以及本國問題化。之後，東亞內部保留各自的特殊性，需要不斷地反覆進入對方文化內部。孫歌在考察近現代日本思想史時跟隨竹內好進入了日本近現代，由此開啟了可以進入魯迅的新視野，然後重又進入中國的近代。⁵²如同孫歌進入日本深處獲得了重新觀察魯迅的視野，我們也需要韓國學人深度進入中國，以深層觀察的眼光，重新解釋韓國。「文化翻譯」正盼望著這類學人的出現。

「文化翻譯」可以說是深層翻譯。有一個論者說

「文化翻譯者（cultural translator）是在他文化中發現自文化，在自文化中滲透他文化的文化翻譯的實踐家」，⁵³補充說明的話，文化翻譯是將文本中烙印的他國文化帶入本國文化語境。帶入前，一定需要進入他國文化語境。東亞區域內的跨文化和溝通是雙向多向往返的行為，這些反覆的差異因為積澱而可能。

需要補充一點的是，韓中文化交流中，韓國的中國研究者的作用。較之要融匯韓國和中國的散漫姿態，更需要充實履行很好地聯繫兩者的「文化調整者（cultural moderator）」的作用。調整者的作用從單純的媒介，到填補兩者的匱乏，具備多重譜系。因此文化調整者可以稱為文化翻譯家。換言之，韓國的中國研究者持文化翻譯的心態和方法論，不懈地努力聯繫中國的研究者及韓國的研究者。同時也期待擴大中國的韓國研究者的基底，積極發揮他們的中國文化調整者的作用。韓國和中國的翻譯、翻譯批評和翻譯研究的任務就在於此。

52 孫歌著，劉俊畢、金越會譯，《亞洲思維空間》（坡州：創批，2003），頁 51。

53 李祥斌，〈文化翻譯的文本性再現和「翻譯」〉，《通翻譯學研究》18.4（2014）：121。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教授級 NT\$60,000 副教授級 NT\$50,000

助教授級 NT\$40,000 博士候選人 NT\$40,000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臺幣一百萬元（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研究期限：一個月至一年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含著作目錄） 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截止日期：每年 5 月 31 日（申請隔年 1 至 12 月來臺研究）

※ 如欲了解詳情，請洽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或上網查詢申請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886-2-23147321 傳真：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ncl.edu.tw http://ccs.ncl.edu.tw